

“同科学家作战的魔鬼是混乱的魔鬼。而不是心怀恶意的魔鬼。”

——《维纳著作选》

古 乐 目 录 学 述 要

王 德 坝

音乐生活的发展，产生了繁富的歌曲、乐曲、乐种，在此基础上产生了音乐目录工作；对音乐目录的概括和理论抽象，形成了音乐目录学。音乐目录中有大量的古曲目录、古代乐种目录，它们的总和称为古乐目录。对古乐目录与古乐目录工作的概括和理论抽象，形成了古乐目录学。

毫无疑问，古乐目录学同古典目录学关系亲密，后者较为成熟，是古乐目录学发展之良鉴。一般来说，古典目录学的任务是古文献研究，它同版本学、校勘学并列，都致力于古籍的整理、研究。

古乐目录学与古典目录学都属于世界性的目录学体系。古乐目录学是其中^{其中}一个活跃的分枝，可以称为一种专科学。

同古典目录学一样，古乐目录学也信奉宋代学者郑樵提出的

“同科学家作战的魔鬼是混乱的魔鬼。而不是心怀恶意的魔鬼。”

——《维纳著作选》

古乐目录学述要

王德坝

音乐生活的发展，产生了繁富的歌曲、乐曲、乐种；在此基础上产生了音乐目录工作；对音乐目录的概括和理论抽象，形成了音乐目录学。音乐目录中有大量的古曲目录、古代乐种目录，它们的总和称为古乐目录。对古乐目录与古乐目录工作的概括和理论抽象，形成了古乐目录学。

毫无疑问，古乐目录学同古典目录学关系亲密，后者较为成熟，是古乐目录学发展之良鉴。一般来说，古典目录学的任务是古文献研究，它同版本学、校勘学并列，都致力于古籍的整理、研究。

古乐目录学与古典目录学都属于世界性的目录学体系。古乐目录学^{其中}是一个活跃的分枝，可以称为一种专科学目录学。

同古典目录学一样，古乐目录学也信奉宋代学者郑樵提出的

“编次必谨类例”之通则，同样以“剖判条流，甄别科部”的分类法研究为己任。因而古乐目录学完全能够为传统音乐分类学提供直接的支援。

古乐目录学与传统音乐分类学的关系是：前者以后者的某些方法作为对古代乐种、乐曲分类编排的参考；后者以古乐目录学的研究成果来丰富自己的内涵。国内外各式分类法正是在编目等实际需求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评价目录优劣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其所用的分类法如何。可以说，古乐目录学与传统音乐分类学这两门学科彼此交叉，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么，如何统一二者分类标准的问题，将可能成为它们共同面临的突出的矛盾。

古乐目录学同中国古代音乐史也是一种交叉关系。它在中国音乐史教学中有提纲挈领、指导学习途径之功效，它能使读者“即类求书，因谱究学”，为进一步的学习和研究扫清障碍。因为无论怎样详备的中国音乐史教材，即如杨荫浏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厚厚的上下两册，仍然只是一部概述，远不能穷尽丰富的古乐目录资料。同时，学术界对这些目录资料评价不同，往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论无定论。故不如介绍目录学知识，自去追根溯源，钩稽搜微。

古乐目录学既以“辨章学术，考镜源流”为宗旨，就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中国音乐史研究中日益迫切的、扩大音乐史料的要求。

经过系统整理的古乐目录资料，克服了历史积淀中的混乱，增强了科学性，具有广阔的运用前景。这是古乐目录学必然出世的原因之一。

我国古乐目录资源丰富，非作专门研究不可。故古乐目录学虽然同多门学科交叉，又有很大的独立性。在不久的将来，实可望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

笔者主张建立古曲目录学是基于如下的考虑。

在中国音乐史、中国古谱学的研究中，免不了要涉及不少古曲，其中大多“佚亡”、或一时仅存篇目。但这些曲目往往在考查乐曲流变，或考查总结某一断代、某一音乐家创造等方面发挥意想不到的作用。

笔者在研究琴曲《广陵散》曲体流变的窘境中，悟到了古代曲目是一个丰饶的古代音乐的信息资源，在相关史料奇缺的情况下，自己动手整理曲目，并作排比研究。同时，提出了“古曲目录学”的概念（见《星海音院学报》3/36）。

然而，古曲目录学本身，却早已在我提出之前就已经存在并有着不可低估的研究成果。

最早提出古曲目录功能并付诸实践的是北魏太乐令崔九龙。据《魏书·卷109·乐志》：“初，侍中崔光、临淮王琚并为郊庙歌词，而迄不施用。乐人传习旧曲，加以讹失，了无章句。后太乐

令崔九龙言于太常卿祖莹曰‘声有七声。调有七调。以今七调合之七律。起于黄钟。终于中吕。今古杂曲。随调举之。将五百曲。恐诸曲名后致亡失。今辄条记。存之于乐府。’莹依而上之。九龙所录。或雅或郑。至于淫俗。四夷杂歌。但记其声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又名多谬舛。莫识所由。随其淫正而取之。乐署今见传习。其中复有所遗。至于古雅。尤多亡矣。”

崔九龙既有古曲目录学的理论。又有采录曲目的实践。故值得重视。

第一从太乐令的职责来考虑问题。“恐诸曲名后致亡失”。有历史的责任感。但限于当时不可能有今天那样的技术、人力、物力等条件。他但求“曲名”传世。

第二采录曲名（含“声折”与歌词）“存之于乐府”，继承了汉乐府的曲名目录传统。

第三无分“雅”、“郑”，有曲则录，继承了周代采风的传统；放弃政治标准。纯科研；不排斥“四夷杂歌”，不存种族偏见。尤可令人称道。

第四崔氏将五百多首“今古杂曲”，按当时流行的“今七调”为标准进行分类。较之汉乐府按流行地域分类。是古曲目录分类学上的一个创新。当然。这也是由于时代条件有所不同之故：长期战乱，“海内分崩。伶官乐器皆没于刘、石”（《晋书·卷23·乐

下》)雅乐衰微,面目不清;俗乐与少数民族音乐又充分融合,有的乃至“不能知其本意”,“但记其声折而已”。因此,也只能按乐调分类。

第五崔氏的预见已被历史证实。不久,果然“复有所遗”,至于呆板僵化的雅乐,更是如何奈何地走向衰亡,“尤多亡矣”。

第六崔氏所著的古乐目录功不可没。我们今日据之方知所谓“清商”,原来就是《明君》、《吴歌》以及《荆楚四声》等乐种、乐曲的总称。而这些乐目、曲目本身,已经离我们十分久远了。

第七、崔氏对“谣俗、四夷杂歌”,使用传统的“声曲折”记谱法,用以记录其曲调部分。因乐谱没有语义逻辑之功能,方有“不能知其本意”之叹。由此证明“声折”就是“声曲折”乐谱。此谱法仍沿用于北魏,或有所改进。这样,我们就找到了汉代“声曲折”与北魏“声折”一脉相承的线索。

对崔九龙这位古乐目录学先辈,应给以相当的评价。

撇开对古代乐种目录的研究,从古乐目录学中可以分出古曲目录学。其具体解释如下:

古曲目录是古曲曲名与乐曲解题之总称。“目”指曲名或书名,前者为“小目”,后者为“大目”;曲名汇集的专著,则称为“专目”。“录”是对“目”的说明和编次,包含乐曲之解题。古曲目录学包括古曲目录编纂事业及其研究、古曲目录之运用于研究的方法

及其成果的介绍等等。

中国古曲目录的传统方式，是既列先朝曲目，又列本朝曲目。其志在“纪百代之有无”，“广古今而无遗”。实际上虽未搜罗尽净，但大体上能反映今人和前人的创作。如《晋书·卷23、志第13、乐下》然。因而它可供我们查明乐曲沿袭、曲名修改、歌词修改的情况，并由此获得或印证古代音乐制度变迁的信息。

中国古曲目录学发轫于《诗经》所载歌诗、笙诗的编目，在数千年中得到了发展，积累了丰富的古曲目录文献和研究成果。其类别大略如下：

国家藏曲目录

史志（艺文志、乐书、乐志、音乐志等）目录

私家藏曲目录（私人藏书家目录与私撰目录）

总之，中国古曲目录学事业，决非单纯的曲名登录，而是从学术研究的角度着眼而兴起的。它包括广搜异本、比勘考订、分类归属、撰写曲目、编写解题，直到完成目录编制这一系列工作程序。这已经成为中国传统音乐值得骄傲的特色之一而卓立于世界乐坛。如今，是到了专门加以整理、发掘、利用，发扬光大的时候了。

古曲目录学应当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既直接服务于中国音乐史和古谱学，同时，对音乐集成的编纂、对文化史研究，对现代音乐编目事业和电脑编目，都有现实的参考价值。

近年来，学术自由，人们对传统的研究质疑，重新思考，重新评价。在进一步扩大史料的客观要求下，古曲目录学势必有一个发展时期。

当代重要的古曲目录学文献，姑且挂一漏万地举出：查阜西所著专目《存见古琴曲谱辑览》，这是他1956年率小组对全国琴人及现存资料调查、采访、编撰而成的。还有杨荫浏的《中国古代音乐史稿》中“各朝曲名表解”。吉联抗编译的音乐史料丛书，如“魏晋南北朝音乐史料”中的“汉时‘短箫饶歌’各曲曲名衍变表”和“曲种歌名录目”，精心梳理，一目了然。以及常任侠《汉唐间西域艺术的东渐》（《音乐研究》2/80）中的曲目研究等等。

古曲目录学既对音乐领域所特有的目录现象展开研究，它之作为一门新学科有着完全充足的理由。同时，我们肯定它，还因为它有用，有助于课题设计的突破。在这一点上，古曲目录学的确是当之无愧的，可惜尚不大为人所知。

一般人容易理解古乐目录学之为人们利用书谱资料提供服务这一实际用途，或曰“图书馆价值”，不容易理解哪怕是一个见名不见曲的曲目，仍然含有一定的信息量。而这在学术上是极可宝贵的。

由于古代音乐载录手段不完善，大量的乐种、乐曲被人们无可奈何地宣告佚亡，仅存目录而已。这是古乐目录学同文史界的古曲目录学在研究对象上的一个重大区别。因而对见名不见曲的目录的

研究，应当成为以“修复”古乐为己任的古乐目录学的一个专门的研究重点。

我们搜辑那些“亡佚”曲目的目的，不在于发发思古之幽情，而在于如实地反映各代的音乐创作；考证“亡佚”曲目与存见乐曲之间的关系、流变，并作出新的解释，为整理传统曲目提供理论指导；复活佚曲，勿使整部湮没；建立纲纪检索系统。

这里，我想谈一下古曲目录学与系统研究的功能方法相结合的问题。

笔者在考证琴曲《广陵散》曲体结构的流变时试用了这一方法。

我们知道，在从事科学研究时，常常有一些尚待认识的客体，由于种种条件限制，其内部结构的奥秘一时不能被人们直接观测到，仿佛是一个既不透明又不透风的箱子。这种箱子就是系统。有的系统本身不容许我们深入其中，因为一旦深入其中（有时刚跨进门坎），系统的结构立即会发生变化甚至质变。有的系统则是我们无法深入其中。如具有不可逆转性质的历史发展便是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对这样的“黑箱”，维纳和阿什贝采用了系统研究的功能方法，又称为“黑箱”法或“黑箱”理论。

“黑箱”理论的关键就是依靠研究系统的功能来推测它的内部结构。

《广陵散》曲谱尚存，我们尽可以较方便地用一切分析法来研

究它的结构（当然，剖析是否正确是另一回事），故它的“黑箱”性质不在于此。

《广陵散》黑箱之成其为黑箱，在于它那异常长大的45拍的结构在两千年的历史中是如何形成的。自中古起，它的曲体就不断扩展。由于史料不足，我们无法窥测它何时扩展，由谁扩展，以及扩展的具体内容。这是乐坛公认的难题。

《广陵散》是纵向时间坐标上的“黑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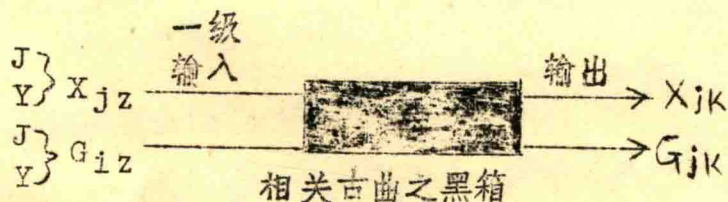
“黑箱”理论的基本原则是：不打开也不进入黑箱，而是利用外部观测，通过考察对象与周围环境的关系来了解黑箱的特性与功能。而我们又恰好处于无法进入《广陵散》黑箱的窘境之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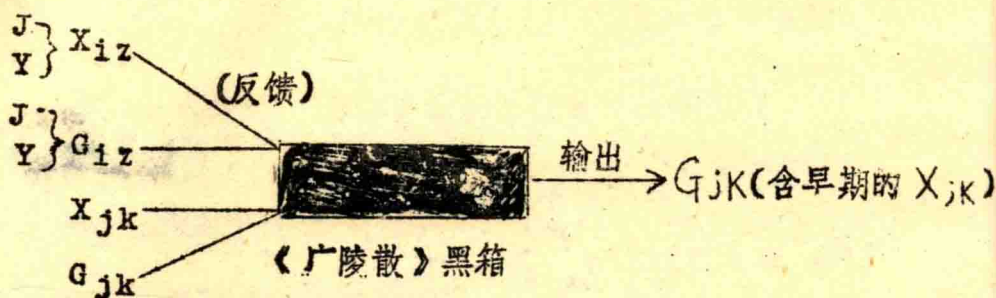
这时，古曲目录学就为《广陵散》黑箱提供了“周围环境”。

具体作法是（详见《星海音乐学院学报》3/86、4/86）：

第一根据相对孤立的原则，确认黑箱。将《广陵散》及相关的曲目看作一个整体。每一个“相关的曲目”都尽可能作了考证从而确认其“合法”身份。以《广陵散》为核心的^{“解曲组合”}（1Z）与^{“解曲扩展”}（JK）体系的建立，就意味着确定了《广陵散》的输入与输出。

那么，这就意味着《广陵散》黑箱的确立。





第二定量综合分析，考证《广陵散》黑箱。

《广陵散》 G_{jk} 的求得，是立足于各式 $1k$ 功能的模拟，这正好就是传统控制论的重要出发点。但是，乐曲的考古自有其本身不可忽视的特殊性。如果“确认黑箱”是一个“大胆假设”，那么，我们还需要对它“小心求证”。

考证之一，《广陵》小曲及《广陵散》流传演变的“单一性”（又参《中央音院学报》4/85拙作）。

考证之二，由 X_{1z} 发展到 G_{1z} 。第一阶段，以 X_{1z} 之体系为主导；第二阶段，以 $Y-G_{1z}$ 体系为主导；第三阶段，以 $J-G_{1z}$ 与 $Y-G_{1z}$ 为参照。并且，这三个体系均以《广陵》或《广陵散》为贯通线索，并使之与以 $J-X_{1z}$ 为中心的横向体系相交织，构成具有整体贯通功能的琴曲流变网络。

考证之三，定量综合分析。丹尼尔说：“社会科学获得新威望和理由之一，就是定量分析。”《广陵散》黑箱的考察，是在统计基础上的定量分析，是定量分析与定性分析相结合的多标准的综合

分析。

第三建立“滚雪球”式的曲体模型，阐述《广陵散》黑箱。即利用对系统的输入、输出和反馈的观察分析得到的数据，以及原有的对《广陵散》的知识，建立起《广陵散》的“滚雪球”式的曲体结构模型。下一步，就应当据此对《广陵散》黑箱的功能特性作进一步的定性、定量的，以及静态和动态的分析评价，对整理发掘这一“曲之师长”，作出科学的判断。

当然，对《广陵散》黑箱，目前还只能用“阐述”而不是“阐明”的措词。这是因为依靠系统ik功能来探测其曲体结构的形成，有的推论还带有不确定性。因而充其量也只能使之变为“灰箱”。果真如此，笔者已经十分满足了。

欲由“黑箱”而“白箱”，欲增加研究结论的可靠程度，还需要增加尽可能多的可控变量与可观察量，使之更接近历史的真实。由于研究的资料与工具有限（在大变量研究中还必须运用电脑分析），笔者条件简陋，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因此，《广陵散》模型的完成还需要作进一步的研究。

由此可见，古曲目录学虽属草创，但它一旦与系统研究的功能方法或其他研究方法相结合，就有可能为乐曲考古的破关而拼合成一件不可忽视的“新式武器”，恕我冒昧！那么，一旦古乐目录学由草创走向成熟，它的作用就不言而喻了。

再谈一下古乐目录学的衍中与发展。综上所述，古乐目录学是一门历史悠久而又年青的、亟待继续发展的科学。我觉得，我们应当狠抓基本建设，做好古乐目录的编制，作成古乐目录产品，为研究提供方便的、现代化的检索工具。同时，重视古乐目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用以指导古乐目录的具体工作。前文已述，古曲目录学能够指示研究途径，又能同他法相拼合，为乐曲考辨提供有力的认识工具，即重新认识今存古谱的本来面目与价值。因此，我们还应当建立近现代音乐目录体系，尽快投入研究，建设近现代音乐目录学。

古录目录学加上近现代音乐目录学，就是音乐目录学。

我们应当支持已有的音乐图书馆、音乐资料室的目录检索工作，完善各种书本式目录、音乐期刊目录、活页目录、附录式目录、卡片目录、缩微胶片目录、机读磁带目录，还有各种实用的音乐目录，如馆藏音乐目录、通报目录、交换目录、征订目录等等，这些，都可以纳入音乐目录学的研究对象之中去。

音乐目录的规范化、数学化是音乐目录学将面临的重要课题。现在提出来，或许为时尚早，算是多余的话吧。

我谨吁请学界诸先进都来关心古录目录学的建设。

八七年六月于花溪

八八年四月二稿

贵州民族学院艺术系民族艺术研究室 印

再谈一下古乐目录学的衍中与发展。综上所述，古乐目录学是一门历史悠久而又年青的、亟待继续发展的科学。我觉得，我们应当狠抓基本建设，做好古乐目录的编制，作成古乐目录产品，为研究提供方便的、现代化的检索工具。同时，重视古乐目录学基础理论的研究，用以指导古乐目录的具体工作。前文已述，古曲目录学能够指示研究途径，又能同他法相拼合，为乐曲考辨提供有力的认识工具，即重新认识今存古谱的本来面目与价值。因此，我们还应当建立近现代音乐目录体系，尽快投入研究，建设近现代音乐目录学。

古乐目录学加上近现代音乐目录学，就是音乐目录学。

我们应当支持已有的音乐图书馆、音乐资料室的目录检索工作，完善各种书本式目录、音乐期刊目录、活页目录、附录式目录、卡片目录、缩微胶片目录、机读磁带目录，还有各种实用的音乐目录，如馆藏音乐目录、通报目录、交换目录、征订目录等等，这些，都可以纳入音乐目录学的研究对象之中去。

音乐目录的规范化、数学化是音乐目录学将面临的重要课题。现在提出来，或许为时尚早，算是多余的话吧。

我谨吁请学界诸先进都来关心古乐目录学的建设。

八七年六月于花溪

八八年四月二稿

贵州民族学院艺术系民族艺术研究室 印